



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5年起任冯玉祥将军的国文教师，抗战期间兼做秘书工作。1942年起，先后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49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西柳集》、《饭余集》、《山洪》、《吴组缃小说散文集》、《说稗集》、《拾荒集》、《宿草集》、《宋元文学史稿》（合著）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小说研究论集/吴组缃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ISBN 7-301-03420-2

I. 中… II. 吴…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5701 号

书 名：中国小说研究论集

著作责任者：吴组缃

责任编辑：马辛民

标准书号：ISBN 7-301-03420-2/I·434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2018

编辑部 62752032

排印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850×1168 32 开本 13.75 印张 33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中国小说研究论集

本书获得
杨超成先生提供的出版资助
特此致谢

目 录

关于向优秀古典作品学习技巧的问题	(1)
关于古典作家的世界观	(8)
生活·写作·读书	(17)
短篇和长篇小说创作漫谈	(33)
《历代小说选》编选说明	(47)
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理论	(49)
关于现代派与现实主义	(57)
漫谈文化传统	(81)
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90)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95)
关于《三国演义》	(100)
谈《三国演义》	(107)
谈《水浒》	(116)
林冲的转变	(129)
关于《西游记》	(135)
关于《金瓶梅》的漫谈	(144)
颂蒲绝句(二十七首)	(147)
《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153)
关于吴敬梓的民族思想问题	(188)
从电视系列剧《儒林外史》谈起	(192)
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工作并略谈《红楼梦》 ..	(195)
论贾宝玉典型形象	(205)
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	(253)

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	(267)
漫谈《红楼梦》亚东本、传抄本、续书·····	(286)
略谈《红楼梦》研究·····	(295)
在第六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299)
读《动摇》·····	(324)
评《子夜》·····	(328)
关于《霜叶红似二月花》·····	(332)
谈《春蚕》·····	(334)
一味颂扬是不够的·····	(360)
介绍短篇小说四篇·····	(362)
谈《阿Q正传》·····	(368)
说《离婚》·····	(381)
《西柳集》序·····	(399)
《鸭嘴涝》赘言·····	(400)
《山洪》后记·····	(402)
《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	(405)
《吴组缃作品选》序言·····	(407)
如何创作小说中的人物·····	(410)
文字永远追不上语言·····	(417)
关于《樊家铺》的时代背景·····	(422)
答美国进修生彭佳玲问·····	(424)
编后语·····	(433)

关于向优秀古典作品 学习技巧的问题*

这次的大会，我们听了负责同志的几个很重要的报告，跟着又经过小组会的座谈讨论，在当前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面对我们光荣的文学任务，我们认识上显著地有了提高，有关我们工作的各种问题有了更明确更具体的办法和措施，并且按照需要与可能，做出了全面的详细的规划。对这些，我心里所得到的鼓舞力量，是难以说明的。

周扬同志《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全面地分析和总结了一九五三年第二次文代会以来有关我们文艺战线的斗争和创作方面的情况，对今后的工作作了周详、扼要、精辟而又恰当的指示。这个报告的内容非常丰富，因为时间匆促，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地学习，现在还谈不上有什么体会。但因为昨天听了谷峪同志的发言，他谈到过去脱离生活，单钻技巧所走的弯路。现在我仅就向古代文学作品学习技巧的问题来谈谈我的粗浅的意见。

我个人已有多年没有从事创作。最近两年因为教学工作的需要，读了一些我国古代的小说。我听了周扬同志的报告以后，在小组里谈到向我国古代优秀古典作品学习技巧的问题。周扬同志的报告里谈到艺术技巧的问题，他不是单独地提出来谈的，像报

* 本文是作者一九五六年三月三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的发言。

告对其它方面的问题一样，他是把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深入生活、掌握知识和艺术技巧这三方面同时提出来的，就是把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同时提出来，这是全面的提法。这样的提示，我认为对我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向中外经典作品学习，加强我们的艺术修养，学习技巧，我认为对我们是重要的。尤其向我国古代作家学习，在过去——在“五四”以来的作家中，是比较的忽略了。那时候，比较偏于看重外国作品，作家们在向外国作品学习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比较多些，而对我国古代作品则比较的忽略。有些作家桌上经常放着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肖洛霍夫的作品，写作的时候遇到困难，随手拿起一本来翻翻，想在里面学些门道、找些办法，或者说，活动活动脑筋。从外国大师学些窍门，从外国文学中吸收营养，当然是必要的，不可少的。我们不必担心，以为吃了外国制的食品，就会变成外国人。不会的。“五四”以来的作品，还是中国作品，不只语言是中国的，不只所反映的生活是中国的，而且那看生活的方式、那总的精神实质也是中国的，决不会变成外国的作品。但是有些作品，却不免带些外国气味，这种外国气味有深有浅，中国人民一时不能习惯。我们常说“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句话。毛主席指示我们创造艺术作品要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但我们“五四”时期的作品，人民大众心里不喜欢。就在现在，这种情形还是存在的。除了少数的例外，如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刘白羽同志的《无敌三勇士》，高玉宝同志的《半夜鸡叫》等。有些小说，要读给我们普通的人听，他们不是不喜欢，但是不十分习惯，就如不大出门的人借了别人的被窝睡觉似的。

如刚才叶君健同志所说，我们知道不只在国内如此，在外国读者中也特别喜欢我们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但是昨天谷峪同志的发言，却提出了向古典作品学习技巧，

学出偏差的例子来。谷峪同志对此已有很好的说明，我现在再补充一些我的看法。

我们觉得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之一，好像是特别讲究写情节、故事。我们的古代小说的内容，总是可以津津有味地谈出来。因为情节精彩，故事有趣，就好记，就好谈；谈出了情节故事，人物的性格也就跟着谈出来，思想主题也跟着介绍了出来。这样，不只读的人印象深，喜欢谈，听的人也容易被吸引，听得聚精会神。过去我们许多人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注重情节故事的作品是低级的；唯有着重写人物，才是高级的。这是把写情节、故事和写人物分割开来看，对立起来看。其实我国古代的优秀作品并不如此。它们总是通过精彩的情节，有趣的故事，把人物性格非常深刻、非常生动地写出来。外国小说，一般不是这样，往往长篇大论地写场景，长篇大论地刻划心理。这使人放下书，难于记忆。托尔斯泰写安娜和渥伦斯基在跳舞会里，在赛马场里，写得真好，真吸引我们。但是放下书，精彩处就只能留在心里，不容易谈出来使听者受到吸引。《罗亭》是本好书，我们也难于谈出来。

学习我国古代小说描写情节、构造故事的技巧，有没有必要呢？当然必要的。但单从技巧上学，我以为不单是不够的，而且也是不行的。因为技巧为主题服务，技巧同时又是跟着从生活中所取的题材来的。离开了题材与主题学技巧，就如学了便宜坊或全聚德挂炉烤鸭的办法来烤粉条、烤白菜，那结果一定一团糟。

《红楼梦》像我国其它的古典现实主义名作一样，十分讲究写情节。抄检大观园，有许多精彩的情节描写。其中之一，是探春打了王善保家的一个耳光，打的很重，声音很响。这一打，给我们印象极深，这段描写富有感染力量，有重要的意义，有丰富的内容。那要点，我以为就是这一情节集中地有力地揭示了复杂的深刻的现实矛盾，而且揭露得非常尖锐。因为探春是“庶出”，

在那个社会里，一个“庶出”的地主官僚家的姑娘是要被人轻视歧视的，这是这个要强的三姑娘所不甘、所不能忍受的事。所以这就成为她心里的一块病。这个痛处，使她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护着。为了保卫自己，为了争得封建主义统治下官僚地主社会的地位和可能的幸福，她的思想性格中老存着这个矛盾，时时在言语行动中表现出来。现在，一个奴仆，而且是“那边屋里”的邢夫人的陪房，竟奉命来搜查她，而且敢于轻举妄动，来动她的身上。这在别的姑娘都可以容忍，或者算不了什么。但对她，则正好碰上了她心里的最痛的痛处；她时时刻刻防护着的就是这个。于是王善保家的，就出乎意料地突然挨了那又重又脆的一巴掌了。这一击，因此就突出地写出了探春的性格和思想的特征。并且这情节所揭示的还不止这一矛盾，不只这一“正出”、“庶出”的矛盾，还揭示了王夫人邢夫人妯娌之间的矛盾，揭示了主与奴之间的矛盾，揭示了封建统治势力与处于被损害被牺牲的地位的姑娘之间的矛盾。——这些我们且不去说。这是就打人的探春方面，就矛盾的一方说。另外还有被打的王善保家的一面。因为别的奴仆，是不敢那么得意忘形地向这位出名厉害的三姑娘去动手动脚的，只有“那边”大奶奶的陪房在抄检大观园这一体面差使的特殊情况中，只有处于这样地位、情境和具有这样思想性格的王善保家的才会如此。因此这一打，也深刻入微地打出王善保家的性格，并表现了许多意义。总之，这一击的情节，有深厚的、丰富的内容，有多方面的意义，突出地、集中地表现了探春的性格和王善保家的性格以及她们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的复杂的特征。这一情节的描写，若从技巧方面看，当然是高的：写打不过几笔，事情本身也简单，也平常，但在这里，就显得这样动人，这样有意义。思想性艺术性两皆高强，难道不是顶高明的技巧吗？周扬同志的报告里说：“许多作品中人物性格的简单化又常常是和故事情节的简单化相关联的。我们的作家往往不注意或

不善于选择曲折的引人入胜的情节来构成人物性格发展的线索。”我国古代小说这种写情节的技巧还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但是这种写情节的技巧是从那里来的呢？显然是从作者对于生活的熟悉和对于生活的观察、体验和研究而来。作者的这种本领或技巧，是从他所掌握的生活知识、生活体验来的。没有丰富的生活，他就不可能选择、概括与安排出这种引人入胜的精彩的情节。同时也从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从对生活的热爱而来。那一打的描写中，显然流露出作者对于他所爱憎的生活现实的强烈的爱憎。因此，那一段的描写中，尖锐地揭示了矛盾，表现了激烈的斗争，具有强烈的倾向性。这又和作者的先进思想或认识能力是不可分的。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技巧、生活，和认识能力、爱憎感情是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一体。当然，像巴金同志所说，只有先进的世界观，是不能成为成功的作家的，他还得熟悉生活，还得掌握艺术技巧。可是反过来，若是没有足够的生活，那就也谈不上技巧；没有先进的世界观，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热爱与熟悉人民的生活。

有人单学技巧，我们过去在学校的学生的习作中常发现这种现象。他们没有生活，却学到些名作的技巧，于是单要技巧，就成为耍小聪明，看着真叫人难受。

老百姓有这样一句话：“你以为你跟斗翻得好看，你不知道你连裤子都没有穿呢。”离了生活耍技巧，就是没穿裤子翻跟斗。自以为聪明，实际是丑态百出。

那么，古代作品中的艺术，就不可能让我们学，只可供我们作美学的欣赏了吗？我的意见不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学的。并且对我们的创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怎么学？我认为，我们应该学古代作家怎样热爱与注意他们的生活，怎样认识与感受他们的生活，从中找出一些途径，得到一些启发，教我们怎样在生活中去观察、体验与研究生活。这就是加强我们的艺术修养。艺术

修养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不可少的。

我以为应该像这样地来学习古代文学艺术遗产，不知道对不对？

我上面只在《红楼梦》中举出一例。《红楼梦》中描写人物，有说不尽的办法，有说不尽的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如宝钗扑蝶、黛玉葬花、湘云醉卧，以至晴雯补裘、香菱解裙。这些情节描写，也和上面所举的例相似，都有丰富的内容和意义，突出地写出了人物性格，并且那场面和情节的本身也是一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的画面和构图，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感染力非常之强。曹雪芹是个杰出的画家，有很深的美术修养，这样一些情节，也是曹雪芹以他的高度艺术修养从他的生活中摄取而来、加工出来的。因此，这些描写，也同样可以启发我们怎样去观察体验与研究我们所深入的生活，教给我们一些艺术地认识生活的途径。

不只《红楼梦》，《水浒》中如风雪山神庙写林冲，《三国演义》中如关云长单刀赴会、三顾茅庐，都是如此，这里不细说了。

总之，我们应该从古典作品去学习如何在深入生活中去观察体验生活，如何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在深入生活中去深刻地认识与敏锐地感受生活。

我以为这样学，我们就能学到一些描写情节、构造故事的本领和技巧，也可以学会掌握语言的本领，用很少的笔墨写出丰富的内容。

语言的简练，也是我国文学的一个特色，这也是我们今日应该学习的。我们有些文章写得篇幅很长，可是内容不够丰富不够深厚，我们不会提炼，和上面所举的例子正相反。我以为这主要还是由于缺少很大的概括力与很高度的集中力。比如下象棋：没本领的棋手，走了一着车，只为去吃对方的卒子，那一着的内在蕴藏就单薄，内容就贫乏。如果人家的卒子跑了，就白走了一

着，那一着就变得毫无内容。尽是这样的动着棋子，文章就冗长，而废话甚多。有本领的棋手，动了一着，内可以防御，外可以进攻；管住了人家的车，还威胁了人家的将军。一着中有多方面的意义，有丰富的内容，那情形就不同了。写作的能手也是这样。我以为，根本上还是在于对生活的熟悉。有了丰富的生活认识与体验，才谈得上提炼。语言的提炼，实即生活内容的集中；没有生活，是学不来的。

党号召生产建设，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我们的文艺创作上好像与“省”结合不上。其实不然。“省”就是作家省笔墨，让报刊省篇幅。很少的篇幅有很丰富的内容，很高的教育意义，很大的艺术魅力。

作为作协的会员，我现在是个没有作品的作家。因此我上面说的这些，都好像不会游泳的人勉强讲游泳术，就如脱离生活的人讲技巧。我现在正在争取重新学习写作的机会，我已经在用心向在座的同志们学习先进的经验。

关于古典作家的世界观

文艺界有些人不承认作家的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硬说艺术创作方法和世界观没有关系。他们搜罗种种理由来支撑自己的妙论。他们想出来的理由之一，是说“古典现实主义大作家从来不讲什么世界观，也不谈什么思想改造；他们的思想或世界观并不高明，可是反倒写出了伟大不朽的作品”。类似这样的唠叨，近两年我们常常可以听到的。

像世界各国一样，我国古代有许多大作家出身于上层统治阶级，这是事实。他们有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主动地要求自我思想意识的改造呢？他们是否曾经像我们今天这样，要求自己抛弃陈腐落后的世界观，努力掌握新的先进的世界观呢？我们回答说，诚然，这是没有的。因为他们生当那种长夜漫漫的时代，历史没有为他们提供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优越条件，他们自己也不可能有这样高明的自觉认识和要求。在我们看来，很显然，这是他们的不幸。

但是——请注意，我们却万万不可因此就认为他们持着一套陈旧过时的世界观，倒可以创作出富有人民性的作品来；只要稍有一点文学史的知识，就知道这是绝对没有的事。事实恰好相反。他们总由于各自特有的身世遭遇和生活变化，在思想感情上或思想意识的某一点上突破了旧有的世界观，探出鼻子呼吸到时代的新鲜空气，放开胸怀感触到广大人民跳动的脉搏，这时他们才拨云雾而见青天，看到了一些生活现实的真相，有了一些自己的社会生活的理想，他们由此才获得支持自己不容于当时世俗的内心的力量，才获得欲罢不能苦心孤诣的从事创作以反拨世俗、

批判现实的热情和动力。这是说，古代的大作家，虽然没有条件和可能，完全抛开自己的旧世界观，但总在原有的世界观里面，萌生了进步的思想意识，感情上靠近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精神上站到了时代的前列，他们这才有可能掌握较好的创作方法，这才有可能写出有光彩的作品来。

拿我国清代几个现实主义大作家来说，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是大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可是他们年纪不大，家庭就开始没落。到了他们从事小说创作的时候，已经弄得精穷，有时连饭也吃不饱了。这是大家知道的。他们当然没有经过主动自觉的思想改造。可是他们家庭败落的过程，他们长期沉沦以至陷入穷困不堪的境遇的过程，说不尽的丰富深刻的阅历和体验，自会逼使他们内心发生剧烈的自我斗争，自会逼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从富贵家庭子弟，成为本阶级的判逆；从封建统治阵营里面走出来，靠近到广大被压迫人民这边来：这种思想感情的转变，在当时具体条件下，难道不就是他们所能达到的阶级立场观点的转变么？正是他们在实际生活锻炼里所导致的这种世界观巨大的变化，才保证了他们取得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明显的表现在他们作品的具体描写里面，构成为他们的作品的主要部分。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从功名富贵问题，即当时知识分子的路出路问题，辛辣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堕落与无耻，有力地抨击了社会政治制度的腐朽和罪恶。曹雪芹的《红楼梦》，则以恋爱与婚姻的悲剧为中心，对当时上层统治阶级和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展开极其广阔、极其深彻的批判。他们不仅仅以清醒的头脑抨击了走向崩溃的黑暗现实，同时也以正义的敏锐感觉和饱满的热情，歌颂了他们所能看到的显示未来光明的力量，以及崭露头角的鲜嫩的苗芽。这是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明白告诉我们的。

我们还可以根据一些文献资料，看看他们生前亲密知交的思想情况来作个比较。资料虽很不够，但可以这样说——即他们所

交往的朋友们的思想，在当时都不算落后，可是比起这两位作家来，思想见解就显得远不能及。他们虽然交情很深，可是有些亲密朋友，并不能真正了解这两位大作家的精神内心。比如“脂砚斋红楼梦”的批语，有许多确是出于和作者亲近的人的手笔。其中有关人物褒贬的，往往站在封建家长的地位，发些维护礼法的议论。尤其涉及父母管教子女或子弟受封建教育的事，总是拿贾宝玉作借鉴，深致慨叹和惋惜之情；而对薛宝钗和花袭人的行为品德，则一贯表示欣赏和赞赏。可见这些批者并不懂得作者曹雪芹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又比如吴敬梓的一位最知己的朋友是程廷祚。程廷祚有一封给吴敬梓的关于所谓“葺（茸）城女士”的信^①。这个女子因为反抗被迫的婚姻，丢开豪富的夫家，和“名门旧族”的父母，只身逃到南京独立谋生。吴敬梓对这样一个奇女子表示非常的尊敬和同情，特意拿她作为影子，创造了反封建反世俗的沈琼枝的光辉形象^②。可是程廷祚的信里却对这个女子的特立独行加以贬斥，发了一些什么“反物为妖，是为邪慝”的腐旧议论，并且责备吴敬梓对她“有矜奇好异之心”，要他劝导那女子“翻然改悔”，回到自己父母那里去。从这事，就知道为吴敬梓所钦敬的这位知友，比起吴敬梓自己来，那思想水平就矮了一大段。

这也并不足怪。古来的大作家感觉自己不为人所了解，感觉内心的孤独与寂寞，是常有的事。

上面这些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我们古代大作家的思想具有他的当代人难于企及的崭新的地方，他们是站在时代的前列来看社会现实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大作家，已经完全抛开旧有的世界

① 见程廷祚《青溪文集续编》。

② 见《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

观，取得了另一完整体系的新的世界观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他们的具体条件下，要他们的立场观点获得根本的蜕变，那是不可能的。上面说过，他们只能在思想感情的主要方面，或在思想意识的某一方面，突破旧有世界观的束缚，因此产生了或接受了新的思想因素；在他们旧有世界观里面，形成一个新的相互矛盾着的部分。就吴敬梓和曹雪芹说，构成他们作品主要内容的，是他们从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观点所认识到的生活真实。但就他们整个世界观来看，不管说吴敬梓的思想属于正统儒家体系也好，说曹雪芹的思想属于佛老体系也好，总之他们的世界观都还没有脱出封建主义的范围。这是说，主导着他们写出作品主要内容的那民主主义思想的新的因素，还是包括在旧有的封建主义世界观里面的。这种精神内心的矛盾状态，会使人感到难于忍受的苦痛。我们看见过一种“大眠”里的蚕，它的新体已生，可还被旧的皮蜕紧紧地包着，要脱一时也脱不出来。像吴敬梓和曹雪芹的精神内心，是有这种苦痛的。但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们虽然伟大，也没有本领揪着自己的头发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环境里拔出来。因此我们说，像他们这些大作家是不幸的。

吴敬梓和曹雪芹这种思想观点的矛盾状态，在他们的作品里是清清楚楚摆着的。

比如《儒林外史》从唾弃功名富贵这一点着眼，否定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否定了臣对君的“忠”的伦理道德；并由此鼓吹安贫乐道的淡泊襟怀，提倡夫妇相敬相爱和对于妇女人权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书中一贯倾心于下层社会的小民，颂扬他们朴厚笃诚的高尚品性。这些都可以说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思想因素，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思想。但是同时，他又极力宣扬“孝”道和“悌”道以及朋友之间的“信”“义”之道；他所宣扬的这些，仍然不出封建主义伦理的范围。而且他倾心于贫贱小民，可又赞美他们的安本分，守规矩，如书中所写鲍文卿对向鼎